少儿编程这部“好经”别念歪了

杨国营

教育观察

“未来文盲的标准就是不会编程”“人工智能时代来临，让孩子提前掌握基础语言”……几乎是一夜之间，少儿编程成为教育圈的一大热词，更悄然成为校外培训市场的新宠。但是，最近也有媒体披露其存在夸大宣传、课程多噱头、师资参差不齐以及低龄化等问题，引发家长群体担忧。

《中国少儿编程行业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0月，少儿编程软件用户达1550万人。从大约2013年开始孕育、发展，少儿编程行业刚走过不过5年时间。有市场人士信心满满地预计，长期来看这将是一个千亿元级的市场。实际上，编程教育的兴起并非偶然。2017年7月，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完善人工智能教育体系，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逐步推广编程教育。美好前景加上政策驱动，不少培训机构闻风而动。对教育潮流感知敏锐的部分家长带着孩子躬身入局，而驱使他们的最大动力，并非学习一门技术、锻炼一种思维，而是更为现实的目标——升学。自从教育部明令取消奥数高考加分之后，2018年初，浙江、上海等地确定把编程作为高考科目正常对待，与理综科目平齐。南京、天津等地则将编程纳入中考特招范围。在一些地方中小学尤其是民办学校，少儿编程日渐成为招生的重要考核标准之一。

“早学早有优势”“未来升学加分项”，面对培训机构的这类宣传语，想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的家长们根本没多少免疫力。于是，不管孩子年龄大小、身心发展情况以及是否有兴趣和天赋，一窝蜂式的报班现象在一些地方开始出现。不可否认，少儿编程对学生的思维开发有益，但它同奥数类似，并非每个孩子都适合学习，都能学好，最终能靠它敲开名校之门的更是少数，大多数孩子仍将沦为陪跑者。

在培训市场上，少儿编程教育已覆盖从小学到高中，并大有向学前教育渗透的趋势。一些培训机构一再向家长灌输这一学习的零基础和低龄学习优势，甚至有四五岁的孩子被忽悠去学编程。教育专家研究发现，受大脑发育水平、阅读理解能力等所限，少儿编程教育要在10岁之后才适合进行。过早、过深让孩子学习编程，倘若孩子学习受挫，不但达不到掌握技术、开发思维的目的，反而可能打击孩子的自信心，透支其学习兴趣。

少儿编程教育从一开始就带着市场化的基因。我国的少儿编程教育仍处在起步阶段，优质师资的匮乏、课程的不完善是诸多学校面临的共同问题，这就为市场上的培训机构提供了可乘之机。对于培训机构负责人和投资者来说，其主要热情不在于教育本身，而在于少儿编程这个噱头背后蕴藏的巨大经济收益。照此发展下去，一项旨在面向未来的教育革新将很快被资本绑架，这对少儿编程教育来说显然并非福音。

其实，在起步稍早的一些教育发达国家，编程教育的主阵地被限定在学校内的课堂里。2014年，英国成为世界上首个强制在校少年儿童学习电脑编程知识的国家。2015年，美国提出计划10年普及中小学生编程教育。此后，日本、新加坡等多个国家相继将编程纳入小学必修课程。但国内部分家长急功近利的育儿观，以及培训机构追求利益最大化目标之下的短平快操作，正在把少儿编程教育从校内迅速扯到校外。倘若沿着这条弯路走下去，很可能会重蹈奥数的覆辙。

因此，对少儿编程培训严加监管势在必行。广告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教育、培训广告不得对升学、通过考试、获得学位学历或者合格证书，或者对教育、培训的效果作出明示或者暗示的保证性承诺。对于一些培训机构将少儿编程教育与升学等挂钩的各种宣传，政府相关部门在新一轮针对校外培训机构的专项整治中，应将其作为重点。

少儿编程教育是一棵未来充满无限可能的幼苗，需要精心灌溉、认真呵护，静待其花开；而不是在它萌芽之际，就过度施肥、拔苗助长。除了为学校的编程教育提供政策、资金和师资支持，使其健康发展，对于市场上的少儿编程培训，政府有关部门绝不能放任其狂飙突进式的野蛮生长，相关整顿、治理措施应尽快跟上，将其纳入正确的发展轨道。

（作者系本报记者）

——/一家之言/——

责任督学自我“年检”很有必要

吕建

新年伊始，中小学校即将结束一学期的工作，重在平时的挂牌督导工作因此进入相对间歇期。在这个间歇期，责任督学其实有必要进行一次自我“年检”。

至于自我“年检”的内容，包括全面梳理过去一年的工作，总结经验教训，对挂牌督导过程中的基本理念、方式方法、关系处理、界限划分等进行深刻的反思，客观总结一年来的工作得失、经验教训。这个梳理、总结应该是高质量的，不能简单、机械，充斥着大话、套话、空话和百搭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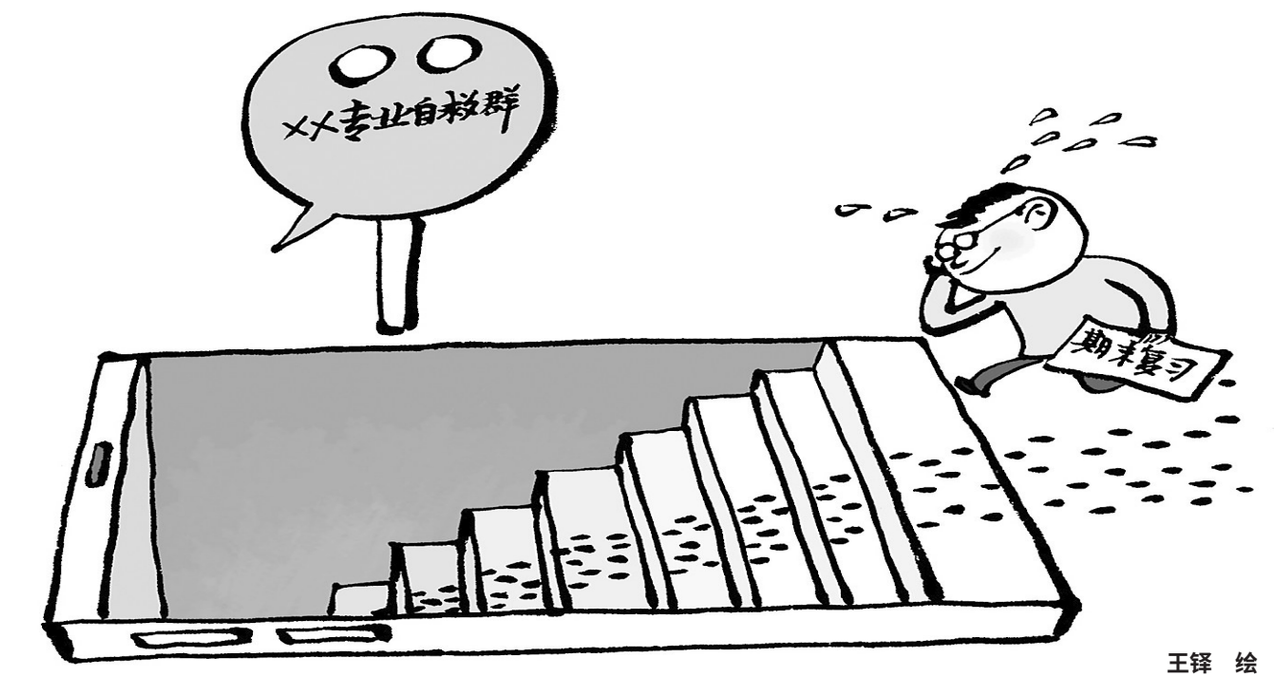
同时，责任督学也要检视、反思教育焦点、热点、难点问题，形成有别于年终总结的文字材料。这些文字材料是对挂牌督导过程中焦点、热点、难点问题的思考、深挖，有典型意义。挂牌督导工作中，责任督学一定会遇到印象深刻又较为典型的问题，也会产生一些心得，检视、反思就是用自己积累的理论知识、实践经验与这些典型事件再碰撞，激发出更深刻的教育督导智慧。此时，外界纷扰相对较少，责任督学可以沉下心来，对挂牌督导所作所为、所思所想进行深加工，形成高质量的文字材料，如督导叙事、案例、论文等。

完善、整理个人工作档案也是自我“年检”的重要内容。个人工作档案是督学责任区档案的主要组成部分，完善、整理个人工作档案，就是以建立档案的方式，总结和思考一年来的挂牌督导工作，以“档案思维”来查遗补漏、分析得失，检视哪些做得比较好，哪些工作还没有做或者做得不充分，据此找到改进挂牌督导工作的路径和方法。

除此之外，责任督学要系统学习与挂牌督导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学习是责任督学确保正确政治方向、丰富工具性知识、增强行政权威与专业权威的基本前提。除了系统温习《教育督导条例》《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法规外，责任督学要重点学习《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关于健全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整改若干工作机制的通知》等文件，增强挂牌督导工作的背景、工具支撑。

拿到自我“年检”“合格证”，责任督学才能安全驶上挂牌督导新征程。

（作者系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专职督学）



王铎 绘

——/ 漫话 /——

考试复习靠微信群？

据媒体日前报道，正值考试季，对外经贸大学的大二学生邱欢欢在开始复习之前首先要完成的一件事是进入两个100多人的微信群。按她的话说，这是为了“自救”。

如今，手机已成了大学生活中离不开的东西，各式各样的微信群成为大学生生活社交、讨论学习、沟通爱好的主要方式。然而，在期末考试季里，微信“自救群”也成为学生们应对种种考试的新“套路”。“自救群”真的是一把通往高分的“金钥匙”吗？不少学生都表示，“自救群”功能多，方便了学生们复习，但需要一定的规范才能真正起到督促学习的作用。

“孩子看到大海，就仿佛看到更远的未来”

——马云和乡村教师为山里孩子直播看海

本报记者 余闯

“来三亚前，我答应孩子们开个网络直播间，给他们看看这里的海、阳光，他们一个个比我还兴奋。”湖北丹江口彭家沟小学教师蔡明镜获得“2018马云乡村教师奖”，她临行前对孩子们承诺，到了海南给很多没有见过大海的孩子通过直播看看美丽的大海。

蔡明镜今年25岁，是这次“马云乡村教师奖”获奖教师中最年轻的一位。2015年，她从汉江师范学院毕业，来到彭家沟小学。这里位于大山深处，是丹江口库区最偏远的一所“麻雀”学校，如今整个学校仅有46名学生、6名教师、一名门卫和一名厨师。

1月14日早上，她在海边用手机与全校的孩子们连线，开始了看大海的直播。“走，离近点，带孩子们去看海。”没想到，马云突然来到蔡明镜身边，加入了直播。

“大家好不好啊？学校里有多少学生？几位老师啊？”马云给镜头前的孩子们打招呼。直播镜头的对面，坐着彭家沟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组成的一个班的几十名学生。

孩子们在教室那头激动地喊：“马老师好！你什么时候来看我们？”马云说：“你们是最棒的！好好学习，我下次去看你们！”直播结束后，马云还特地拉着蔡明镜询问学校和孩子们的情况。

为什么选在三亚奖励乡村教师？马云曾回答：“很多老师从未看到过大海。大海带给人想象，没有想象力的老师会很难教出有想象力的孩子。很多老师是第一次走出大山高原沙漠，第一次乘飞机……”

“全校40多个孩子一起坐在那里，‘哇，大海！’老师说孩子们长大了你们也要来看。为什么我要陪蔡老师和孩子们？就是想让乡村教师们看到希望。老师有希望，孩子才有希望，乡村才有希望！”马云说。

“我在给孩子们直播大海的时候，马老师突然出现了！”蔡明镜说起这段充满温情的插曲，脸上仍泛着喜悦之情。

蔡明镜说，孩子们通过网络看到更大的世界，作文里的海水不再是干巴巴的了。“如果他们不曾见过，就无法产生丰富的联想。有的孩子只知道自己的父母在工地打工，你问他梦想是什么，那就是包工头。但如果你让他看到更多建筑、看到飞机，他会知道建筑师和飞行员，他会有新的梦想和憧憬。”

“大海深邃，学生们看到了大海，就仿佛看到了更远的未来。”蔡明镜说，“我要把在外面看到的世界和体验，带回学校，带给那些怀有无限希望与憧憬的孩子们。”

第十二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启动会召开

本报讯（通讯员 景应忠 记者 朱梦聪）第十一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总结会暨第十二届交流周工作启动会近日在贵阳召开。会议建议，2019年为中国—东盟媒体交流年，交流周平台建设为此要紧紧围绕服务构建更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服务夯实中国—东盟人文交流支柱，服务贵州乃至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交流周主题将围绕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中国—东盟人文交流、深化教育领域务实合作的内容来构思。交流周将在原有五大系列活动基础上新增“一带一路”合作系列活动板块，为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学前教育接轨“一带一路”建设人才培养探索新路径。

呵护好年轻人的奋斗精神

（上接第一版）

我们一直强调要加强高校学生职业生涯发展教育，强调结合就业形势和毕业生特点，帮助大学生调整就业预期，找准职业定位，目的都是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部分毕业生为寻找更满意的工作而辞职，恰恰就是主动适应多元化的就业趋势，主动适应新就业形态、新用工方式，是追求高质量就业的具体表现，是一种更加上进的就业态度，不但不应该非议，反而应该点赞。

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既是民生，也是国计，事关广大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包括舆论在内的社会各方面，对大学毕业生就业过程中的新现象多理解多宽容，就是对年轻人奋斗精神的最好呵护。

（上接第一版）

目前，5个集团化试点已全面启动，每月向贫困地区贫困户采购常用农产品达6000余吨。全省教育系统实现了“校农结合”全覆盖，全省学校食堂向贵州贫困地区贫困户采购农产品占采购总量的40%以上。同时，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等高校在学校设立“校农结合”扶贫农产品直供窗口。

据不完全统计，贵州‘校农结合’带动省内3981个农产品生产基地（合作社）发展，促进产业调整170万亩，覆盖贫困人口10.9万户42万余人。

“线上+线下”：小需求孵出大数据

走进位于遵义市高坪工业园区的汇川区吉仓商贸有限公司配送中心，建筑面积达21000多平方米的配送大楼里，常温蔬菜初加工、肉类精加工、检测中心、米面调味品仓库等多个仓库、功能区一应俱全，大楼外侧的发货月台上，30辆汽车正在有条不紊地装载着即将送往全区148所学校的农产品。

平均每天3万余斤生鲜蔬菜、供货对象近10万人。这样大批量的运送如何保证准确无误？奥秘就在不远处的指挥中心。

来到距离不远的汇川区“校农结合”大数据指挥中心，几十块屏幕上闪动着全区学校农产品供需数据、农村土地数据和天气气象数据。

“大数据平台实现了农村城镇信息互联互通，解决了农村信息孤岛问题。”中心负责人周良仁说，指挥中心把农产品特别是贫困户的农产品更加快速高效地通过智慧物流配送中心配送到包括学生在内的汇川区市民手中。

“但大数据指挥中心发挥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周良仁说，大数据平台现已建成智慧物流配送中心系统、大数据分析系统、农村互联网产销信息发布系统。“大数据分析系统为中枢核心，通过分析用户订单需求数据、农村土地数据、天气气象数据得到本地可种养殖数据以及种养殖的时间分布与空间分布，进而指导整个汇川区农产品的种养殖，科学引导整个汇川区的农业供给侧改革以及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以鸡肉为例，经过大数据平台分析，全区学校食堂70天的鸡肉类总配送量26729斤，预计未来3个月鸡的需求量可达一万多只，经过对汇川区各村镇的环境与气候条件分析，最终汇川农投公司在汇川区松林镇分批次投放了一万只鸡苗，一方面解决了200多户贫困户就业问题，另一方面预计未来3个月到一年汇川区各中小学、幼儿园以及机关单位食堂都能吃到物美价廉的本地鸡肉。

除了大数据分析系统，农村互联网产销信息发布系统则向全国推荐销售汇川“农味”。2018年以来，大数据指挥中心共帮助汇川区贫困乡镇完成8万份订单，实现近40万斤、575万元的农特产品销售额。

供需两侧的“触网”，让信息实现了精准对接。有了这样的“智慧管家”，贫困户种菜更有底了，农户头疼的滞销问题也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遵义市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王录建介绍，2018年4月，播州区乌江镇坪塘村（全省深度贫困村）5.3万斤莴笋出现滞销，得到消息后，该区利用“校农结合”的大数据网络，及时协调贵州弘泰源和三社融合公司（学校食材配送公司）立即与该村对接，10天内全部销完滞销莴笋，采购滞销蔬菜16.6万斤，产值10万余元，户均增收2500元，挽回了合作社的经济损失，保障了入社贫困户的收入。

“原先种菜三季中有一季赚钱就不错了，现在三季都赚钱！”很多贫困户兴奋地说。

“下一步，全省将依托生产基地，探索搭建统一的网络信息购销平台。”贵州省教育厅厅长邹联克说，购销平台下设配送中心，根据学校每天申报信息，集中配送、合理分配，承担起质量检测、物流配送等作用，更好地调控平衡供需双方关系，实现学校与农业合作社、贫困户无缝对接。

“1+N”：小支点撬动大扶贫

走进位于安顺市西秀工业园区总建筑面积达11万平方米的果蔬工坊项目基地，记者看到从西秀区“菜单式”蔬菜基地运送过来的辣椒，正在进行烘干等初加工。

果蔬工坊隶属于西秀区的国有企业贵州绿野芳田有限公司，项目总投资达到2亿元。“现在只是启用了两个厂房，进行简单的辣椒初加工，后期我们还会慢慢启用后面4个厂房，进行辣椒以及其他果蔬的深加工，生产辣椒酱、干果等产品。”公司总经理王珏说。

全区312家中小学、幼儿园所需营养餐食材均由区级平台公司贵州绿野芳田有限公司统一配送。同样是在“校农结合”大数据的采集和分析下，西秀区根据不同土质和水文条件，把全区划分成4个产业区块，每个区块拥有多个“菜单式”蔬菜基地，每个基地分别种养殖不同类型的蔬菜、生猪和肉鸡。

例如，西秀区充分结合岩腊乡山地较为突出的特点，积极引导岩腊乡农户开展生态鸡养殖；刘官乡土质属肥沃疏松沙壤土，所种植山药品种优良、口味纯正。

“目前，西秀的扶贫绿色产品走进了机关单位、走进了大型超市，更走进了华南、华东等市场。”西秀区教育局副局长吴玉松介绍，西秀区实施的“菜单式”产业扶贫，不仅实现了“校农结合”的有效对接，还推动了企业规模化发展，最终引领全区进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精准产业扶贫。

“‘校农结合’是一个支点，可以撬动扶贫任务艰巨的贵州全省的大扶贫。”贵州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调研员、校农结合专班办公室专职副主任郭启光说。

2018年5月，贵州省教育厅发文启动实施教育扶贫“1+N”计划，即以“校农结合”为引领和突破，实施包括学生精准资助、职业教育精准脱贫、高校服务农村产业革命等在内的N项教育精准脱贫计划。

以高校服务农村产业革命为例，贵州将拓展和深化“省属院校帮百村”精准扶贫行动，组织高等院校立足自身人才和科技优势，建立定点扶贫工作机制，大力推动高校全面参与贫困地区对口帮扶精准扶贫，在人才培训、智力帮扶、学生支教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80后的“北漂”田翔，从北京辞职回到了家乡——安顺市西秀区“菜单式”蔬菜基地大西桥镇三铺村，当选村主任带领村民在原本丢荒的土地上进行订单式种植；

在黔南州平塘县卡蒲乡“校农结合”配送中心，农产品检测实验室成为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农学食品等专业学生的实训基地，而旁边办公室的门口则挂上了“新时代农民讲习所”的牌子，成为政府给毛南族村民宣讲扶贫政策、传授种养殖技术的基地；

很多地方的贫困村老人都高兴地说：“儿子和媳妇回来了，地里的蔬菜出山了，乡村振兴有希望了。”